

# 明代宫廷艺术史“空白期”问题的探究

华彬

摘要：空白期又可叫“黑暗期”，这一名词来自明代陶瓷史研究，具体指1436年-1464年，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纪年缺失现象。这一现象不光表现为官窑青花陶瓷年款的缺失，也表现为宫廷绘画上没有明确的年款。横向比较，钱币史上也存在这一问题，其背后的神秘原因至今不明，也没有确凿的具体史料作解释。这种几大艺术门类大规模的缺失现象不太可能是历史巧合，也不可能是集体的艺术断层，只可能是人为的故意，某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本文就这一美术史的特殊现象展开可能的原因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思考和探究，一探空白领域之一隅。

关键词：空白期 土木堡 庙堂之争 复辟 宫廷绘画 陶瓷 钱币 正统 景泰 天顺

## 一、“空白期”概念的由来和研究状况

明代自永乐开始，景德镇御窑厂生产宫廷皇家御用陶瓷开始书写帝王年号款识，自此之后历代官窑制作为一种定式延续，从未更改，唯独在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三朝没有发现传世带款识瓷器，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官窑瓷器的面貌混沌不清，缺少标准，陶瓷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空白期”。

西方和日本学者普遍对这一时期研究比较早，1956年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Pop John Alexander）最早在《阿德比尔神庙藏中国瓷器》一书就提出“Interregnum”概念，意思是“空白期”或“过渡期”的含义，确立了对这一时期的关注和研究。日本学者则普遍称之为“黑暗期”或“黑暗时代”，中国学界则普遍采用“空白期”或“空白点”来指称这一特殊年代。[1]

“空白期”现象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陶瓷史，还同样存在于宫廷绘画史和钱币史，是这个时期的普遍现象。短短不到三十年的三朝更迭，似乎透露着错综复杂的神秘色彩，这与整个明代奇案怪事层出不穷的特质相符。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这段“空白期”研究大多集中于陶瓷史，极少关注钱币史与宫廷绘画史，也极少探讨其形成原因。相对来说，国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和细致，陶瓷史与明代政治史研究都相对丰满。更为可贵的是，高居翰在其著述中敏感地提出了明代宫廷绘画中“空白期”现象的存在[2]，但也仅限于现象描述，并没有探讨深层原因。

目前“空白期”研究都集中于陶瓷史料范畴，具体的重要论述有：

（一）《参透“空白期”瓷艺流清晖——试论明代正统、景泰、天顺青花瓷画艺术》——曹淦源（期刊论文）

文章主要围绕空白期彩绘陶瓷的工艺特征和装饰技法进行分代描述，大量的实例铺陈和对比分析，基本厘清了三朝瓷器在装饰工艺和彩绘技法上的典



图1、景泰元年款识 - 青花“奉天敕命”牌

型样式。其中提到了具有断代价值的青花瓷发掘：1988 年 11 月，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一带考古，瓷片堆积有三层。第一层为书写“大明成化年制”的青花瓷片；第三层为宣德纪年瓷片；第二层大量瓷片无年款，有一部分和宣德瓷风格一致，但多数器物仍有自己的面貌，应属正统官窑瓷。有景泰元年款识青花“奉天敕命”牌，为景泰官窑之孤品 [3]（图 1）。

（二）《“空白期”不空白》——李辉柄（期刊论文）

文章主要围绕空白期出土三朝年款瓷器展开探讨，是具有价值的探讨论文，其中几个地方具有鲜明的观点和判断。

第一点是否定了学界普遍猜测三朝瓷器仿制宣德样式，甚至直接书写宣德年号的可能。“在宣德结束时，御窑已经停止生产，得到恢复的时间是天顺元年（1457 年）……青花瓷器在宣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后却不生产了，这种看法，差不多是不足取的。很可能，生产了许多优秀但没有年号的青花瓷器……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这个时期生产了带有宣德年号的具备 15 世纪风格的瓷器。” [4] 对这种观点，作者引用《明实录》史料阐明“英宗即位之初，凡事节省与民休息，必无继续烧造宣德官窑的可能。” [5] 所以，“既不可能存在着所谓三朝官窑生产过不带年款的瓷器，更不可能正统朝烧制过宣德年款的官窑瓷器。”

第二点是把三朝这种特有的现象归结为官窑

的衰退，而此时民窑的大发展是一种主要趋势，甚至是主要力量的存在。“正统六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件，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器，违者罪之。” [6] 而对于现存的“大明正统年制”“大明景泰年制”“大明天顺年制”的少量存世瓷器，归结为“这种后代书前代年款的做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如在成化时期，也还有书‘大明宣的年制’款，不书本朝年款做法。”

（三）《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民窑瓷业研究》——高宪平（硕士论文）

论文通过对大量文献和纪年实物资料，特别是近些年景德镇城市改造过程中发现的大量窑址遗物的综合分析，对景德镇民窑、官窑、外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目前比较新的资料，值得重点关注。

（四）《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专著）

官方修订的陶瓷史，相对回避了很多没有定论的议题，但在官方资料记载上具有详尽的收录，比如器物的断代，《明实录》的相关记载，大事年表等等，相对坚实可信。

（五）《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蔡路武（期刊论文）

此类研究大体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详尽而仔细，为研究三朝陶瓷空白期特征现象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但在研究重心方面，没有任何研究开始转向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探索。

|     |  |    |      |
|-----|--|----|------|
| 马轼  | 正统中，授司天博士。与戴进并重京师。                           | 正统 | 词臣画家 |
| 姚绶  | 天顺间成进士，官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宁府，遂解官归。                   | 天顺 | 词臣画家 |
| 林时詹 | 天顺间征至京，成化初赐冠带，直仁智殿。                          | 天顺 | 宫廷画家 |
| 姜立纲 | 天顺间授中书，成化朝累官至太仆卿。……世人但知其书法为院体，不知其精于画也。       | 天顺 | 词臣画家 |
| 黄瓌  | 与姜立纲同直中秘。                                    | 天顺 | 词臣画家 |
| 柳楷  | 与立纲同官。                                       | 天顺 | 词臣画家 |
| 詹林宁 | 天顺间召入京师，成化间授文思院副使，直仁智殿。                      | 天顺 | 宫廷画家 |
| 许伯明 | 天顺间，与同邑林时詹一时被征，官文思院副使。                       | 天顺 | 词臣画家 |
| 岳正  | 正统戊辰会元，官修撰，直内阁。降钦州同知，戍肃州。成化初复本官，寻出知兴化府。后谥文肃。 | 正统 | 词臣画家 |
| 吴正  | ……荐入文渊阁，授中舍。                                 | 正统 | 词臣画家 |

《明画录》记载相关三朝宫廷画家





图2、明代 商喜《关羽擒将图》绢本

## 二、明代空白期的宫廷绘画状态

“明宣德后至成化之间（1636-1465），有关宫廷画家的资料记载极为有限。……大体而言，这个时期可说是一片空白。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为宫廷御用而烧制的青花瓷上……”[7]

基本上对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状态，高居翰的这个叙述是相对较早的，后来研究宫廷绘画历史的相关概念基本延续了他的判断和命名，即明代宫廷绘画的“空白期”，单国强《明代宫廷绘画概述》中对这一时期也有详细提及，另外孔六庆在《继往开来——明代院体花鸟画研究》[8]中对于空白期也有所论及。

当然，明代是否有宫廷画院，这个论题依然存在争议，如果这都是一个疑点，那么三朝宫廷绘画就更加让人困惑。好在目前基本认定明代存在宫廷画院，只是组织结构复杂散乱，不如宋代完备而已。三朝存在的缺失明确年款署名的宫廷绘画作品现象，正如景德镇青花陶瓷史、钱币史一样存在极其类似的状态，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其内在的联系和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就宫廷画院的整体发展来看，三朝之前的宣德朝，因为宣宗个人是书画爱好者，也善画，所以此时的明代宫廷画院发展非常繁盛，名家辈出。而三朝之后的成化朝，则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画院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是画家数量还是官职高低和待遇，都是最顶峰。所以绘画不可能在期间三十年突然衰弱和缺失，真实情况应该是宣德朝许多宫廷画家直接过渡到了正统、景泰、天顺，甚至一直到了鼎盛的成化、弘治朝，而即使动荡不堪的三朝时期，也没有停滞发展，许多成化年著名的宫廷画家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宫廷画院的。[9]

具体从宣德、弘治朝进入正统画院的画家大概有徐英、商喜（图2）、韩秀实、郭纯、谢环、李在、戴进（图3）等；而从正统年间新进入画院的画家则有张伦、张靖、殷善、朱佐、倪端、周文靖、夏葵、刘晋、商英、许伯明、林洛、詹林宁、陈钰、林良等，这批画家直接进入成化朝，成为成化画院的中坚力量。[10]

这一时期有明确记载的宫廷画家、词臣画家，相对比较少，而且很多存在争议，显著的现象是景泰年间记载尤其甚少，但正统、天顺英宗统治时期相对记载更多，其所指不言而喻。以《明画录》记载为准列表，《明代宫廷绘画史》中对很多存异画家

做了考据补充，调整相对充分准确，也是比较可信的新资料。

《明代宫廷绘画史》中对于三朝宫廷画家的修订，增加了：韩秀实、韩涌、范暹、沈遇、郭纯、徐英、徐麟、徐容、谢环、谢俊、谢仲容、戴进、李在、郑文英、商喜、商英、朱佐、殷善、殷偕、宛福清、王恕、顾行、李原、潘福、王义、徐福林、张平、宛清、张世禄、张伦、林洛、陈暹、屠芝、俞友文、陈钰、刘澜、黄济、倪端、甯祯、夏葵、周文靖、周全、刘晋、张靖、林良、钟学。[11]

## 三、明代钱币史存在的类似情况

从明代钱币史方面来考察，同样存在相似的年代缺失情况，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时期并没有大量存世钱币，只有零星出土和记载，也存在人为销毁的痕迹。

从目前钱币史料考察，基本上宣德朝之后就不再有铸钱的发现，持续了足足几十年，时间跨度差不多和“空白期”重叠。明代宝钞在当时产生严重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民间使用铜钱交易，但朝廷为了推行宝钞，直接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禁止使用铜钱，直到天顺四年（1460年）才再次允许流通铜钱，并于成化年开始（1465年）疏通铜钱，要求钱钞各半兼收，成化十一年（1476年）拟定铜钱折俸禄。[12]所以目前没有正统、景泰、天顺以及成化年铜钱，这个现象也非常奇怪。

但现实并不一定就是这样，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载说王懿荣曾得建文通宝小平钱，制作面背色泽，与洪武永乐各种小平钱无异。另外高焕文《谈泉杂录》也谈及他曾有藏一枚真钱——“按建文铸泉，准洪武式，亦有大小五等，后为成祖追销，世无传者，故难得之。前见南京物产会陈列古泉，内有建文当五钱一枚，的真，可见当日确有大小五等式也。”这里明确了一个问题，就是建文朝有铸钱发行流通，但被永乐帝大规模销毁追缴，才导致铸钱极为少见，直至今日人们以为建文朝没有铸钱流通。那么“空白期”钱币的缺失就有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没有铸造发行，只能作为暂时的一种猜测。

## 四、产生空白期的诸多可能因素

产生空白期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历来都没有引起高度关注，一方面大概源于史料的缺失，无从考据；另一方面，因为历来认为“土木堡之变”造



图3、明代 戴进《春耕图》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成岁月艰难，各行各业凋蔽，无力于宫廷制作，这个理由一直沿用至今。但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掘后，其中的逻辑开始产生矛盾，对于空白期不空白的认识也越来越普遍，其形成的内在原因越来越值得深挖。现在能够考察的几个可能原因如下，其中依然会有谜团和矛盾，暂且罗列，以供后续研究。

#### （一）土木堡战败

这一时期发生了明代最为严重的军事失败，即土木堡战败，被人解读为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近三十年的历程中，明王朝疲于应付蒙古鞑靼和瓦剌的不断侵扰，无力也无暇投入对文化艺术的规模生产。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时期，属于明代军事外交最为混乱时期，直接促使宫廷政治斗争白热化，牵涉大量人力物力和各派朝臣势力，“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基本可以被看成明代从建国初期的强盛兴发到开始积弱衰败的转折点（图4）。

“己巳秋七月，振不与大臣议，挟天子率师亲征。明日朝罢，使上宣谕出师，又明日即行。大臣仓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与验封郎中赵敏谓：‘虏势猖獗，驾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约大臣上章留之，不从。明日驾出，总兵官以下亦弗预知，军士俱无备，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随之。天时、人事极不顺。”（语出明代李贤撰写的《天顺日录》）如此草率仓促的备战，直接导致全军覆没，皇帝被俘虏，王振自己死于乱军之中。土木堡似乎成了多米诺骨牌，接下来的京城保卫战（《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450页，“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槌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景帝即位、迎回英宗幽禁南宫、夺门复辟、杀景帝、杀于谦、与夺门集团的斗争，短短三十年时间经历如此多的变故和斗争。所以也难怪史料猜测，此时期之所以形成“空白期”现象，主要原因是土木堡之变后，朝廷根本无暇顾及包括瓷器、书画等的创作生产，也已经没有财力和人力来完成每个朝代需要完成的任务。

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实在无法解释为何景泰年间突然有一种工艺突飞猛进，也即从元代开始萌芽的景泰蓝掐丝珐琅此时达到巅峰，并有“大明景泰年制”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藏草瓶传世[13]，似乎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关系。因为无论从工艺还是制作费用等方面来看，景泰蓝绝对是要比官窑瓷器更为耗工耗时，“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

就是最典型的比喻。那么为什么官窑瓷器和宫廷绘画会产生真空期，但似乎又陆陆续续有零星的史料实物发现，神秘之处值得深入探讨。

#### （二）皇族更迭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其实是由瓦剌也先入侵，导致的明王朝兄弟二人之间的权利皇位斗争，最终造成二帝三朝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土木堡战役而引发的皇帝与亲弟弟之间反复的皇位争夺斗争，英宗被俘后先送返、再复辟的曲折经历，直接导致他与景帝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有纪年的瓷器钱币出土，但无传世留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为的大规模销毁。相比钱币这种发行量巨大，回收销毁难度巨大的门类来说，正统、景泰年号的瓷器和宫廷绘画相对更容易人为控制销毁，去年号化。

明代皇族更迭之间，对前朝旧事恣意篡改，这类的史实不胜枚举，仅拿建文帝一案就足以说明这种大规模人为销毁史料的典型处理手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因为懿文太子的早逝，嫡长子继承皇位，于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朱允炆即位，改国号建文，即建文帝。继位之初，建文帝施行新政，改变原有的武装强权高压政策，改为文治宽仁，同时实行削藩以消除地方势力的强大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对南方各藩王奏效，但对于长期雄踞北方的燕王朱棣来说无疑是逼迫，终于触发了他的起兵反抗，打起“诛奸臣，清君侧”的旗号，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叔侄内战，最终攻入南京，建文帝在宫殿起火中离奇消失，强藩朱棣登位，即为永乐皇帝明成祖（图5）。

篡位登基的明成祖，对前朝建文的一切都采取了销毁的态度。首先遭殃的是遗臣，建文帝的家人都被贬为庶人，并被幽禁，而建文朝的忠臣都被屠戮株连，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执至阙下，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最残酷的是实行“瓜蔓抄”[14]只要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一律被牵连，光方孝孺家族被诛杀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人，其余不计其数。其次，朱棣着手抹杀建文朝的存在。政治制度上全部废除建文朝政令，恢复旧制。（《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在道义上彻底诋毁建文帝的正统存在“嗣登大位，崇信奸回，委政近伺，改更祖宪，戕害诸王。自弃于天，阖宫自焚，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祐，鬼神所不容。”（《明太宗实录》卷十上）除此之外努力给自己找



图4、明英宗朱祁镇幼年像



图5、《明成祖坐像图》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正义，“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与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明太宗实录》卷十上）最后，明成祖连建文帝的朝代痕迹和庙号都取消。他直接把建文朝的四年直接改成洪武纪年，“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改明年为永乐元年。”焚毁建文朝所有官方档案和记载，“建文年间上书陈言有干犯之词者，悉皆勿论所出，一应榜文条例普皆除毁。”（《明太宗实录》卷十上）直到万历朝，才有史家敢于对这段历史澄清纠偏“文皇帝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水中，唯恐告忤、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15]而永乐对建文朝最大的官方销毁是对《明太祖实录》的大规模重修篡改。《明太祖实录》初修由建文元年（1399年）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翰林侍读学士方孝孺历时三年完成，而随着朱棣夺权，仅四个月后就开始下令进行销毁并诛杀实录官。永乐元年（1403年）委任太子太史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瑄二修实录完成，得到嘉奖。但仅过八年，于永乐九年（1411年）又下令三修实录，由翰林学士胡广主办，历时五年完成，基本已经彻底篡改了建文朝的内容。在“嫡出”和“靖难”这两个方面全方位对明成祖做了粉饰，甚至不惜把朱棣改成朱元璋正妻马皇后所生，以确定其皇位的合法性，露骨异常。

对于《明太祖实录》的三修篡改，明代史家就批评诟病不断，如顾炎武、沈德符等，而清代夏燮更是说“《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污”，“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于嫡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籍以文其篡逆之名也。”[16]明代永乐皇帝对待建文朝的态度和做法，成为后世对待建文朝的基本态度，导致明代官方一直不予承认建文朝，直至万历朝，才得以纠正，但也只是部分恢复，建文帝庙号未得，不能与明诸帝同列享祀。建文朝的真实史料成为永久性的缺失毁损，很多历史真相无法恢复。而永乐帝恣意篡改销毁前朝史料的手段，也给后世做出了很糟糕的示范，直接影响到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史料真实性，其手段可能直接效仿永乐手法。

正统十四年七月（1449年），瓦剌四路入侵

大明，京城屏障重镇大同眼看要不保，此时宦官王振怂恿英宗亲征，结果各种错误策略和糟糕的天气，直接导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王振惨死。郕王监国，即皇帝位，也就是景帝，改号景泰。景帝重用于谦，积极防御，最后打赢了京城保卫战。英宗也被送回大明，从此就开始了兄弟之间为了皇位的明争暗斗，各派大臣也都参与其中。围绕着南宫幽禁，改立储君斗争不断，最后终于导致英宗被拥护者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半推半挟持直入奉天门，复辟成功。有关英宗从南宫复辟“夺门之变”，景帝被废不久便死于宫中，《英宗实录》已经基本不存在任何真实记录，处处都有后人篡改的痕迹，这一点像极了永乐帝篡改建文朝实录，如出一辙。

“对于这次宫廷政变，特别是景帝被害，明代人多有忌讳。从景帝七年十二月癸亥起的五十一天中，《英宗实录》有近二十处渲染景帝有病，这给人以假象，似乎景帝是病死的。李贤《天顺日录》、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卷五《夺门纪》只言其薨（帝死应为崩），与实录同，而不及其它。陈建《皇明从信录》卷二十、《皇明资治通纪》卷十八、薛应旗《宪章录》卷二十八还说到唐妃等殉葬事，或说赐红帛以殉葬，这已经超出实录的范围了。只有陆鉉《病逸漫记》直书其事：‘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17]

清代史学大都同情景帝而责备英宗，弘历还为景帝立碑题辞：“景帝任于谦，排群议而力战守，不可谓无功于宗社。独是英宗还国，僻处南宫，事同禁锢，而废后易储有贪心焉。天道好还，子亦随死，终于杀，礼西山，实所自取耳。然英宗亦岂得辞寡恩尺布之讥哉！”明朝除了朱元璋葬在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其它十四位皇帝都在北京，而其中十三位都被安葬在昌平天寿山，唯独景帝被草草安葬在金山山麓。可见英宗对于景帝的一切似乎也在效仿着永乐帝，利用各种手段加以篡改和销毁，史料已经淹没，但我们似乎还是能从蛛丝马迹中窥见若干真实。

（三）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民变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时期灾害不断，民变也是此起彼伏，这极大地削弱了明王朝的基础和统治力，疲于奔命，也形成了对于空白期形成的可能原因。

明代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朝代，邓云特先生曾言：“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

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计当时灾害最多者为水灾，共见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见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见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见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见九十四次。此外歉饥九十三次；疫灾六十四次；霜雪之灾十六次，则其尤次焉者也。”[18]

仅从正统年几次大灾害来看：

正统年间，由于北直隶、山东、陕西和山西等省自然灾害明显增加，“递年逃来河南者将及二十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致使河南“食不足以给、地不足以容”。[19]

正统三年，山东济宁州、东平州、直隶徐州属县“七月中骤雨，河溢，……田亩禾稼，淹没无遗”。[20]

正统九年冬至十年秋七月，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瘟疫大作，男妇死者三万四千余口。”[21]

正统三年八月，湖广德安、黄州、岳州、荆州、武昌、汉阳六府“旱乾不雨，禾稼枯槁，秋成无望”。[22]

正统二年冬十月，直隶开州滑县、河南陕州灵宝县、湖广湘乡县“久旱不雨，苗稼灾伤”。[23]

根据《明英宗实录》《剑桥中国明代史》等明史资料考察，到了景泰年间似乎灾难更频繁发生：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

农历七月，应天发生大水灾，淹没了民房。

本年，畿辅、山东、河南发生了旱灾。

本年，大名、顺德、广平、保定、处州、太原、大同七府发生了饥荒。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

本年，陕西四府、九卫发生了旱灾。

本年，大名、广平继去年之后，再次发生了饥荒；顺天、保定、西安、临洮、太原、大同、解州也发生了饥荒。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

农历六月，黄河在沙湾白马头决堤，决口长达七十余丈。

农历八月，徐州、济宁之间，水灾发生，平地之上，水高一丈余，民众的房屋全部垮塌；南畿、河南、山东、陕西、吉安、袁州等地，都发生了大水灾。

本年，永平、兖州久雨，损伤禾稼。

本年，大嵩等二十卫所久雨不停，毁坏了城墙。



本年，江西发生了旱灾。

本年，淮、徐发生了大饥荒，死者枕藉。

景泰四年（公元 1453 年）

冬农历十一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景泰五年（公元 1454 年）孟春（农历正月），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等地下下了很大的雪，有数尺厚，淮东的海水结冰达四十余里，人、畜冻死的数以万计。

农历二月、三月，凤阳八卫下雪不止，损伤麦苗。春夏之间，黄河连续多次在沙湾决堤，引起水患。

南畿、河南、山东等十府一州，雨从五月一直下到八月，损伤禾稼。

冬季，建昌、武昌、汉阳发生瘟疫。

本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广三府，数月不雨，旱情严重。继去年之后，本年，徐州再次发生了饥荒；河南、山东及凤阳也发生了饥荒。

景泰五年（公元 1454 年）

农历正月，江南诸府连续大雪四十天，苏、常等地，冻饿而死者无法计算。

春季，罗山大寒，竹树、鱼蚌全都冻死。衡州下雪，连绵不断，很多人因雪受伤，牛畜冻死的，有三万六千多头。

农历六月初十日（庚寅），易州大方等社，下了很大的冰雹，损伤庄稼一百二十五里，人、马被击死的很多。

农历六月，宁国、安庆、池州发生蝗灾。本月，扬州大潮高邮、宝应堤岸决口，发生水灾。

农历七月，京师久雨不住，九门的城墙很多被雨水损坏；苏、松、淮、扬、庐、凤六府，发生大水灾。

农历八月，东、兖、济三府，发生大水灾，黄河慢涨，淹没田地。

本年，山东、河南发生了旱灾。

本年，杭、嘉、湖大雨，损伤田中苗木，雨一直下了六十天未曾停歇。

本年，两畿十府发生了饥荒。

景泰六年（公元 1455 年）

两畿、山东、山西、浙江、江西、湖广、云南、贵州发生了饥荒，苏、松地区尤其严重。

农历四月，西安、平凉发生瘟疫。

五月初六日，苏州地震，并常镇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

农历六月，开封、保定均发生大水灾。

闰六月初一日（乙巳），束鹿下冰雹，像鸡蛋

一样大，击死鸟、雀、狐、兔等无以计数。本月，顺天大水灾，滦河泛滥涨溢，毁坏城垣、民舍；河间、永平的水患尤其严重；武昌诸府因长江涨溢，损伤庄稼。

本年，北畿五府、河南二府久雨，损伤禾稼；云南大理诸府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本年，南畿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湖广三十三府、十五州卫全都发生了旱灾。

景泰七年（公元 1456 年）

农历五月，畿内蝗蝻延蔓。本月，桂林发生瘟疫，致死者有二万多人。

农历六月，淮安、扬州、凤阳大旱、蝗灾。本月，黄河在开封决堤，河南、彰德的田地、庐舍全被淹没。

农历九月，应天及太平七府蝗灾。

本年，畿内、山东均发生水灾。

本年，两畿、江西、河南、浙江、山东、山西、湖广共三十府，久雨不停，淹没田地。

本年，湖广、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十七府发生了旱灾。

本年，北畿、山东、江西、云南又发生饥荒；河南也发生了饥荒。

跟随自然灾害而来的是民变，这一时期各地民变不断，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起义严重削弱了统治力。正统十年（1445 年）浙江叶宗留领导银矿起义；正统十三年（1448 年）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同年九月，广东黄萧养农民起义；景泰七年（1456 年）大藤峡地区瑶、壮族起义，一直持续到嘉靖年才被王守仁逐渐镇压。[24]

除农民起义之外，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即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严重的流民问题，光荆襄地区到成化之前，所聚集的流民已经达到恐怖的一百五十万以上。[25] 流民聚集带来的是巨大的人口流失和户籍混乱，税负流失，民变不断，简直是焦头烂额，麻烦不断。

## 五、艺术“空白期”内在政治原因的推论

综合现有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妨作出一个比较大胆的推论，也即正统、景泰、天顺短短三十年左右的大明王朝，起码暗藏了两次大规模的“去年号”“毁前朝记录”运动。第一次发生在景泰帝即位，幽禁英宗南宫其间，废太子是最为显眼的举动，更何况销毁正统纪年瓷器和宫廷绘画；第二次则是英宗复辟，勒死景帝之后，这次更为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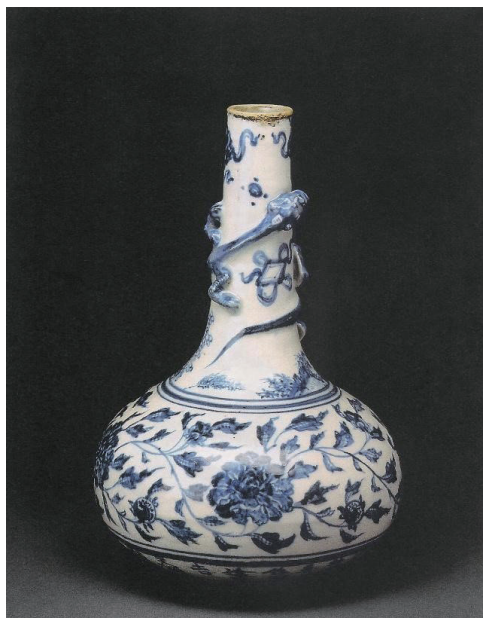


图6、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贴塑螭龙长颈瓶,高31.3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10.4厘米。铭文:“夏梅田都铎源汪村社奉佛弟子程、妻郑氏,喜舍香炉壹付入本里华林供养,仟(祈)俵(求)宦途清吉,天顺伍年秋九月吉日题。”香港艺术馆藏。

带着对景帝的怨恨掀起的销毁运动,篡改实录、销毁年号瓷器和纪年落款绘画,试图把景泰所有痕迹埋葬。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也就基本解释了空白期很多的逻辑关系。

宫廷绘画而言,正统、景泰年间如此众多的优秀宫廷画家竟然无人落款纪年,但天顺却出现了明确的实物纪年款宫廷画家作品。《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和《支那名画宝鉴》收藏周文靖《周茂叔爱莲图》落款:“直仁智殿三山周文靖为英契绍芳兄写景图,肯天顺癸未年七月夕日书于金台官舍。”[26]宫廷画家落款纪年类似于官窑瓷器纪年款,是一种规矩的延续,整个明代到清末都遵循这一规矩,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断层,这种突然的断层一定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才可能产生。

瓷器的情况如出一辙,根据目前资料基本可以知道三朝对于官窑瓷器从未彻底停滞,甚至在规定民窑制作时不得仿制官窑样式,此时的民窑水平也已经无限接近官窑,很多时候甚至是官搭民窑的方式在进行。另外,逐渐出土很多重要纪年的墓葬,如正统二年宁惠王朱盘墓、景泰四年严昇墓、景泰元年“青花敕命”牌、天顺五年青花长颈瓶等明确纪年出土。[27](图6)陶瓷史界已经产生共识,也即“空白期”不空白的判断[28],其中诸多疑点有待发掘考古的进一步印证,但其内在政治原因不妨先作推论。

如果一味相信“土木堡之变”产生的政治混乱和民生混乱导致“空白期”的形成,则无法解释明代末年更为混乱羸弱的几个年代,依然有正规的官窑瓷器生产和宫廷绘画,这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只能是猜测。相反,永乐帝对待建文朝的处理手段反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可信明确的佐证,似乎三朝的处理手段在抄袭永乐帝的各种做法,这也有待于进一步史料的印证而加以深入。

#### 参考文献

- [1] 王志敏. 明初景德镇窑“空白点”瓷. 中国陶瓷, 1982(05).
- [2][7](美)高居翰. 江岸送别. 夏春梅等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3][27] 江西博物馆. 江西元明青花瓷. 南昌: 江西博物馆, 2002.

[4](英)哈里·加纳. 东方的青花瓷器. 叶文程, 罗立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5] 鸿禧美术馆. 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 台北: 鸿禧美术馆, 1998.

[6] 张廷玉等.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 孔六庆. 继往开来: 明代院体花鸟画研究.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9][10][11] 单国强, 赵晶. 明代宫廷绘画史.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

[12]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3] 故宫博物院. 明代宫廷政治史.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

[14] 文翔凤. 南极篇//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15](明)屠叔方. 建文朝野汇编//四库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16](清)夏燮. 明通鉴.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17] 王天有. 南宫复辟与景帝之死.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2(02).

[18]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9][20][21][22][23] 明英宗实录.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 1962.

[24] 南炳文, 汤纲. 明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5] 项忠传//罪惟录·列传(卷十一).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26] 单国强, 赵晶. 明代宫廷绘画史.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5.

[28] 高宪平.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民窑瓷业研究. 景德镇: 景德镇陶瓷学院, 2014.

(华彬, 江苏省苏州国画院副教授)